

吾爱吾师:追忆王祖勋老师二三事(三)

□ 1963级校友 王凯

【编者按】

因为这篇文章,通过微博、博客、E-mail、电话等经常和王凯老师联系,有一次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王凯老师这样回复我:

杭一中教学的特色之一就是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主动性学习,独立思考性学习,创造性学习。面对各个初中升上来的尖子学生,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不用动员的,一中教师的水平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中学教学强调的是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双基教学,再加上高者的指挥棒,很容易掉入应试教育的陷阱。而高等教育是要培养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应用型人才,能不断创新的科研型人才。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在杭一中读书阶段,我们尊敬的金亮校长、王祖勋校长在抓双基教学的同时,着眼教学改革,通过教学方法的改变,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通过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增强学生克服困难,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举办各种兴趣小组,社团活动,培养学生实践动手的能力,实际工作的能力。通过教改实践,使我们受益匪浅。虽然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上山下乡,但对知识的渴求却与日俱增。在1978年初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大学后,我们遵照先师的教诲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我们杭一中人经常讲这样一句话:“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这就是母校给我们的力量,母校给我们的精神。虽然我没有实现年轻时做航母的理想,但当我看到我的学生正在从事“物联网”、“云计算”等计算机前沿科学研究并做出成果的时候。我想,金亮校长、王祖勋校长在天上也有知,也是会高兴的。

老一辈的杭高人对学校充满着如此的热爱之情,对杭高的教育理念有如此的信心,相信我们新一代的杭高人能感受到这种热力,并因之更努力

沉默是金

等到那学生干部回过神来再问王老师什么,王祖勋老师便沉默了。无论学生们七嘴八舌再说什么,王老师就都一直沉默着。

我一再对带队学生干部几次使眼色该快走啦,他才领着同学离开王老师办公室。我又走在最后,一边走一边回头往办公室走廊上的窗户玻璃望去,我看到王老师拿出烟来抽,划了好几根火柴才点着那根烟,夹烟的手指还直晃动,他大口大口抽烟时似乎嘴也在哆嗦。他

一直沉默着……。

近日来班里许多同学多次回忆起文革期间全班同学没有写过王老师一张大字报实属那年月少见之事。班干部们和一些在学校里人脉关系较多的同学还多次想方设法动足脑筋使王老师避免了多次来自校内外的冲击。为此王老师在晚年曾唏嘘不已。我以为除了当时高三学生较为年长理智外,主要还是王祖勋老师一生为师严谨笃学,为人平和宽厚的师德和人格魅力光辉感召了学生们。王祖勋老师是“师爱为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师德精髓的真正实践者。

一番叮咛

1969年元月初,杭一中的校长领导们仍在靠边站。学校革委会已成立许久了,红卫兵小将们也开始不走时气了。杭一中完全是工宣队的一统天下,工宣队们竟敢把具有七十年光辉灿烂历史的中国江南四大名中之之一的杭州一中改名为“杭州炼油厂五七学校”——这等不伦不类的校名,但谁都不敢有一句非议,都只敢腹诽而已。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工宣队正在学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谁敢乱说乱动。

年底前伟人一声号令,一股脑儿地把已读完书未让毕业的和未读完书的老三届学生都被加冕美其名曰“知识青年”都要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文化大革命”的斯摩达克斯之剑终于挥舞到小将们头上了。

我看准了早走晚走早晚都得走,先走后走先后还得走。既然不走不行还不如自己早些选择自己的去向。可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时当然还不明白凡事要“喝第一口水”的潜规则。没写血书表决心,也没贴大字报立志。就先悄悄的打探打探明白我这等人的家庭出身条件能去哪个方向有什么条件要求?后来就选择了去黑龙江同江插队。

听说因元旦前后东北气温太低,去黑龙江插队的要春节后出发。工宣队们早早的要去黑龙江插队的学生把户口都迁了。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否是生怕学生们反悔不去了,还是工作效率实在高。

在等待出发的那一段时间还是去学校的,与相处五年多近六年的老师们和同学们告告别,聊聊那些总也聊不完的话题。我很想去找王祖勋老师告个别听听教诲,去了几次发现大办公室里总有人总有工宣队的人,说话不方

便。就想去王老师家里一趟,可我从没有去过他家。我只听说他住在狮虎桥附近,具体门牌不知道的。我就赶快去找同学加兄要他告诉地址,因为我知道加兄的母亲也是重点中学领导与王老师很熟悉的。估计加兄他一定知道的。

我对加兄一说想法,他很爽气的马上答应和我一起去找王老师家。加兄还开玩笑地说:“好啊,我去浙江农村插队也快出发了就在月底前走,是要与王老师说说的。我们趁机还可以到他那里打一记土豪,借几本好书下乡看哦。”我哈哈一笑也没当真。

记得王老师的家就在狮虎桥教工宿舍一栋暗红色旧三层楼,好像是个筒子楼。他家在二楼西头就一大一小两间房还套着。王老师很高兴的把我俩迎进了那间大房间,只见除有窗户一面墙外,靠墙一周都摆了书柜装满了书,书柜顶上堆的书都快挨着天花板了。余下就是一张放满书报的小书桌和大床没有其他陈设。隔壁小房里师母陈老师和弟弟妹妹正忙着什么,从半开的房门望去也只能看见有小方桌和小床等。记得王老师简陋的家便使我好意外。

当王老师听完我与加兄的话后,他点上烟沉思了许久。记得王老师说:“也好啊,要是你们继续在上学的话,按理明年也该毕业参加工作了,现在插队下农村走向社会还提前了一年哩。你们早晚要走上社会的。在你们父母眼里、在我眼里你们还是孩子,但在别人眼里你们可都是成年人味,所以做事处人都要先思后行才好。凡事不能由着自己性情来,先要想想他人再想想自己。成年人得有成年人的样子哦,不能再让父母老师操心啦。”

“在社会上处事



杭一中1966届高三(7)班学生向恩师告别

处人还是自以为非多一些好,不要轻易否定别人的意见。多听听大家的。你们俩千万要记得与同学老乡们都搞好团结,不团结会给自己带来许多麻烦的。”

“你们下乡是当农民哦,可不是你们在校时到勾庄萧山下乡劳动一周或两星期,我看这一去少说说三五年,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才好。下乡当农民与在城里做学生仔是绝然不一样的,去东北农村就更不一样了。还是1964年周总理鼓励北京下乡知青侯隽的那句话,“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要过好两关,就是生活关和劳动关。”(下接2、3版中缝)

不想回忆

王凯

——入学杭州一中高中五十周年有感

回忆真的很痛苦;
一抹殷红的青春,
都毁于一场难以逆转的风雨。
远眺着沙漠里隐约飘渺的海市蜃楼、
仰望高处挥手的学子们啊,
都还不曾弱冠及笄。
回忆真的不浪漫;
唯有无知与轻信,
一举手却又那么亢奋激昂。
任凭你要把头颅掷向理想,
也捂不住从伤口流出绝望。
回忆真的不惬意;
时空苍茫变幻,
心灵在老去,被岁月改换频率。
夕阳浸入大海,被荡漾昔日尘埃,
余晖里涌动着;反思和新的希冀。

癸巳年 庚申月 庚午日(2013年9月1日)



王凯校友在黑龙江省同江县

酵母菌遗传学研究先驱——陈士怡校友小传

求学经历

陈士怡(1912-1994),1912年5月4日出生在浙江省宣平县城和乡(现武义县岭下乡)少妃村的一个“义门家风”匾额的耕读家庭。兄弟七人,排行老五。

陈士怡6岁进学校读书。当时,他所就读的学校,既读四书五经等古文,又学数学等自然科学,也就是说,在经历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其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甚至教育体制等正处在一个新旧变革的转换年代,特别是科学救国的思潮深刻影响着年轻的陈士怡。由于他天资聪颖,记忆力特别强,加上勤奋好学,力求上进,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喜爱。一位教过陈士怡古文的廩生先生非常赏识他的天资、勤奋和宽厚待人的品格,并在陈士怡小学毕业时曾对他的父亲说:“若在前清,你的儿子一定会中举人、中进士,前途无量,你应该让他读书。”因此,陈士怡的父亲,曾怀着光宗耀祖、兴家立业的思想打算将来让陈士怡去中央大学学习法律,好当大官。然而,此时的陈士怡,已从古文的学习和临摹字帖的范文中领悟到荣华富贵犹如过眼烟云,至多昙花一现而已,认为做人要格物致知,穷自然之理,那才是无穷尽的。他把“事有终,理无穷”写成六个大字放在书桌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直到很多年后,他还常常饶有兴趣地讲述他年轻时如何从古文中学到许多人生哲理和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也是他矢志研究自然科学以穷自然之理的思想萌芽。

1927年,陈士怡第一次离开山村来到金华,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现为金华一中)读初一。可是就在这年秋天,父亲染伤寒症去世了,这无疑给他家庭的经济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他的母亲忍受着极大的悲痛,仍设法让陈士怡继续上学。陈士怡亲眼目睹当时广大农村,特别是他那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因缺医少药,瘟疫流行,亲人及乡亲因无钱就医而遭受疾病折磨和死亡的悲惨情景,曾一度萌生将来当医生的念头。

1930年,陈士怡初中毕业后即到省城杭州考入浙江省立高级中学(现为杭州高级中

学)。当时农村的贫苦和落后,母亲生活的艰辛,都时时激发陈士怡加倍勤奋学习,奋发向上。在中学期间,陈士怡学习非常刻苦,认为这是今后做学问和立身处世打基础的关键。所以,他对各门功课采取兼收并蓄,决不偏废任何一门功课。在谈到他后来改变学医初衷的原因时,他回忆道,在高中阶段,有一位曾留学日本的生物老师,课讲得非常生动,有条有理,引人入胜,并常常引导和启发学生思索大自然的奥秘很受学生欢迎。久而久之,他对生物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33年,陈士怡高中毕业即参加了浙江省全省高中会考,因其成绩名列前茅,被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保送进入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

刻苦研究

1937年,陈士怡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获学士学位。毕业后,适逢当时的浙江省实业厅在舟山开办浙江省水产试验场,计划挑选一名浙江籍的大学毕业生的去当实习生,然后派往英国留学,将来回国后从事浙江的海洋水产研究。经著名生物学家蔡堡教授(也是杭高校友,1910年代入读杭高)推荐,陈士怡于1937年8月到舟山浙江水产试验场当实习生。然而,未两个月,就因日本侵略军将要攻占舟山而被迫离开试验场,最后辗转回到武义老家,任方园学社的数理化教员。1938年,经贝时璋教授介绍,到内迁江西赣州的同济大学生理学院生物学系任助教,协助德籍教授G.科勒(G. Koller)担任动物学的教学工作。不久,学校内迁昆明。此时,因科勒教授已应召回国,陈士怡一人担任了动物学、组织胚胎学和无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的教学工作。

陈士怡一如既往,仍以满腔热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投入教学工作。直到1940年7月,当他的老师蔡堡教授得知陈士怡的研究兴趣乃是遗传学时,即聘请他到已内迁遵义的中国蚕桑研究所任助理员,后任研究助理,从事

家蚕的数量性状遗传学研究。在中国蚕桑研究所的5年时间里,他如鱼得水,兴趣盎然,出色地完成了家蚕的数量性状的遗传分析,发表了8篇有关论文,为中国的家蚕选育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根据。

留学经历

由于陈士怡的这些成绩以及他一贯勤奋工作和突出的研究才能,1945年,该所的上级主管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决定选派他去日本留学,但由于日本侵华造成陈士怡感情上的伤害,遂改派赴法国。1946年5月,他取道印度加尔各答到达巴黎,经谈家桢教授介绍,进入法国巴黎生物研究所的遗传研究室,师从著名胚胎学和遗传学家B.埃弗鲁西(B. Ephrussi)作研究生,进行遗传学研究。最初做的是有关果蝇眼色的遗传,但当他完成温度对果蝇眼色突变的作用之后,即随导师埃弗鲁西从果蝇转向酵母的遗传学研究。

陈士怡在遗传研究上的一个突出成就就是在研究酵母营养型小菌落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种分离型小菌落及其遗传机理。1947年,来到法国不久的陈士怡,当他在法国巴黎生物研究所遗传实验室完成温度对果蝇眼色遗传作用的研究后,导师埃弗鲁西就告诉他,用酵母进行遗传学研究比果蝇有更多的优点,并要他尽早转向酵母的遗传研究。这也是陈士怡的科学机遇和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陈士怡在导师的指导下,很快就掌握了解剖酵母子囊的显微操作技术。接着他提出了一个单倍体细胞对单倍体细胞的直接交配法,以改进酵母杂交中的孢子对孢子和单孢株细胞对单孢株细胞的群体交配的传统方法,这样就更可迅速、更直观和更可靠地获得二倍体杂种,从而为酵母遗传学研究创建了一种新方法。陈士怡的这一开拓性研究成果,曾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广泛重视,不仅被有关专著所引用,而且写入普通遗传学教科书,这无疑为遗传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8年8月,由系主任G.提西厄(G. Tissier)和导师埃弗鲁西的推荐,在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遗传研究所兼任研究助理。1950年6月,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在整个留学期间,陈士怡在科学事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他并没有完全沉浸在实验室里,而

是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和解放,并积极参加了巴黎中国学生会,还参与筹建了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巴黎分会。在1949年2月至3月间,被选为巴黎中国学生会的执委,担任秘书长,积极支援国内的学生爱国运动,并为促进祖国的解放在留法学生和旅法华侨中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学成回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陈士怡欢欣鼓舞。但当时,伦敦和莫斯科电台已开展了所谓米丘林遗传学派与摩尔根遗传学派的争论。同时,苏联的一些著名遗传学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使陈士怡颇感疑虑,担心回国后能否继续开展遗传学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认识到刚刚新生的祖国,一定需要人才,需要科学,而科学总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苏联在遗传学方面的做法,可能不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演。于是,他终于告别了给他创造优厚条件并热诚挽留他的老师,满怀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踏上归途,于1950年10月回到祖国,应聘为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教授。由于当时中国的课程设置深受苏联的影响,他回国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原有的遗传学不能讲授,只能讲米丘林遗传学。在这种情况下,陈士怡只能去教动物学、无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和微生物学概论。1952年院系调整后,陈士怡任浙江农学院教授兼生物学教研组组长,遗传学课程仍不能正常开设,他只好继续去教动物学,并悉心编写出版了《动物学》教科书。1954年兼任浙江农学院教务长,开始了他一生繁忙的教务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一直以党员第一,教授第二的认识对待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1958年5月,陈士怡参加了杭州大学的建校工作,同年9月,原浙江师范学院与杭州大学合并,他即调任杭州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和生物系系主任,后辞去教务长职务,专职生物系系主任,直到1987年退休。在他任系主任期间,曾冲破各种阻力,组建了遗传学教研组,开设遗传学课程。后来又积极与同仁筹划成立了杭州大学生物研究所并任所长。他的不懈努力,为杭州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可概括为呕心沥血几十年,任劳任怨到退休。



陈士怡

1

蔡堡校友